

第四章 國際環境下的軍事發展戰略

在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經濟全球化與世界格局多極化趨勢不斷深入 21 世紀初期，中美日之間既存在著許多利益矛盾，又有不少共同利益。正確確認、把握這些雙邊以及多邊之間的利益矛盾和共同利益，是展望中美日三角關係發展的基本依據，也是中國制定切實可行的對美、對日政策的基礎。

第一節 中美 - 都是世界「最大」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和國際關係史上最為複雜的一對雙邊關係。中共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共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大的已開發國家。由於兩者都是最大，決定了中美兩國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切利益矛盾和衝突，但是也存在著不少共同利益。這就決定雙邊關係具有兩面性：既有對抗、衝突的一面；也有合作、互利的一面。

一、中美之間的利益矛盾

中美之間的利益矛盾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全球戰略上的矛盾；二是地緣戰略上的矛盾；三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的矛盾；四是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衝突。隨著中共的不斷強大，前兩個矛盾會越來越突出。美國把中共看成是能在未來挑戰其霸權地位和和在東亞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最主要國家，而中共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自己的作用，要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就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美之間在人權、貿易、台灣、武器擴散、中共加入世貿組織等問題上的衝突主要是由這些矛盾決定的。

（一）在全球戰略及建立世界新秩序上的矛盾

在國家利益至上的當今世界，大國關係本身就是一種競爭關係。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大國與現今正主導世界的大國之間，競爭更為激烈。從國際關係史來看，新崛起的大國必定要對現行的世界格局和秩序構成挑戰。美國戰略家們確信，中共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而崛起後的中共必定會挑戰美國的地位，從而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冷戰時期美國以蘇聯為敵，進行遏制政策，主要原因還是蘇聯成了美國稱霸世界的障礙。冷戰後，美國成了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並取得了真正的霸權地位。美國要極力維護自己的這種特殊地位，將之視為自己的最高利益，誰要是威脅到了它的這種地位，它就反對誰，遏制誰。中共要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在國際舞臺上佔有一席之地，要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因此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就要推進多極化，反對單極世界。這與美國的全球戰略是矛盾的。在建立世界新秩序問題上，美國要建立的是美國領導下的世界新秩序，而中國要建立的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世界新秩序。雙方之間也存在著矛盾。

（二）在地緣戰略上的矛盾

中美都是亞太地區大國。維持在亞太的霸權地位是美國的戰略目標之一。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對美國來說，歐亞大陸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現在，美國這個非歐亞大國在這裡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這種地位直接影響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支配。而中共則是能夠影響美國保持這種地位的最主要的國家之一，是一個主要的地緣戰略棋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1998：41）。布熱津斯基認為：中共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大國。它還可能有更大的抱負，因為它在歷史上是個主要強國，把自己的國家視為全球的中心。中共的各種選擇已經開始影響亞洲的地緣政治力量分佈，而它的經濟發展勢頭必將使它有更強的物質實力和更大的雄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1998：59-60）。很顯然，中共的這種

雄心與美國的地緣戰略目標是矛盾的。正如布希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女士所說：中共仍然是一個對亞太地區穩定的潛在威脅。它的軍事力量目前尚不能與美國相匹敵，但這一狀況並不必然地永久保持下去。我們所知道的是，中共是一個有一系列關係到其切身利益的問題尚未解決的大國，特別是在台灣和南中國海問題上。因此，中共不滿美國在亞太地區發揮主導作用。這就意味著，中共不是一個謀求維持現狀的力量，而是希望亞洲的力量平衡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變化的力量。僅這一點就使中共成為我們的戰略對手，而不是柯林頓政府曾稱呼的戰略夥伴（Rice, 2000: 56）。萊斯的觀點代表了美國決策層中強硬派的對華政策思想。

The Economists 在 2001 年的「China's increase in defence spending」提到，隨著中共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共正在不斷加強軍事實力。中共的國防費用自從 10 年前的波灣戰爭後一直穩定增長。特別是，就像許多國家那樣，中共在正式公佈的預算中所披露的軍費只是實際數字的一部分，實際費用要高於所披露數字的 2 倍至 5 倍。這種認識增加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共的不信任感，並且為美國加強軍備特別是發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National Missile Defence）和 TMD（Theater Missile Defence）製造了藉口。

美國學者羅伯特·羅斯從地緣政治角度分析了東亞安全的兩極結構。他認為：東亞因中、美分享地區主導權而成為兩極。在東亞，“由於蘇聯解體，俄羅斯內部不穩定，目前只剩下了中共和美國仍然保持著大國地位。只有美國和中共擁有追求地區霸權所需的地理資產。中共的優勢與利益在大陸，美國的優勢及其利益在海上。美國把中共作為地區不穩定的根源予以關注是恰當的。因為在 21 世紀的頭 1 / 4 的時間裡，中共是唯一有可能挑戰美國海上勢力的國家。除了美國，它也是唯一可能把地緣政治與「上升中的大國」的經濟先決條件結合在一起而挑戰東亞兩極結構的國家。同

樣，中共對美國表示戰略懷疑是很自然的事，這就像美國也懷疑中共的那樣。美國是東亞唯一一個對中國領土統一構成挑戰的國家（陸伯斌，2000：68）。雖然羅斯認為，由於受地理影響，美國和中共都不可能去挑戰對方的勢力範圍，但這種東亞安全的兩極結構就已經使中美兩國的安全利益處於某種對立狀態。

（三）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矛盾

在當今世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實際上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影響著決策者對本國根本國家利益的判定。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是價值觀。正如基辛格所認為的：共同的價值觀減低訴諸武力的願望（顧淑瑩、林添貴譯，1997：60）。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指導下的資本主義是一對天敵。社會主義就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其目標就是要從地球上剷除資本主義，並取而代之。而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絲毫不隱瞞這一點。不可避免地，資產階級把社會主義當成了洪水猛獸，極力孤立、限制、遏制、扼殺之。從十月革命勝利、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時起，在美國就形成了一股反共主義思潮，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美國參加了協約國對蘇俄的武裝干涉，後來長期不承認蘇聯。30年代在歐洲支持英法對納粹德國搞綏靖；在亞洲綏靖日本，縱容其侵略中國，用意主要都是想將禍水引向蘇聯。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是反共主義的影響達到高峰的表現。

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明確宣佈將實現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並且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存在。1949年，剛誕生的中共決然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並在外交上採取了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政策。以後中蘇分裂、中美關係緩和並恢復正式外交關係、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都沒有動搖中共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目標。特

別是蘇聯東歐劇變後，中共在西方國家的強大壓力下，仍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大目標被寫進了中共憲法。1999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是這樣表述這個大目標的：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而中共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可避免地招致了美國的敵視和遏制。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出於對付蘇聯的需要，與中共保持較密切的戰略關係，暫時把意識形態利益放在一邊。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聯華抗蘇策略仍然服從於反共這一總目標，在美國戰略家們看來，蘇聯是共產主義的大本營，為了擊敗蘇聯這個最主要的共產主義堡壘，美國可以和中共這個次要的共產主義堡壘結成戰略同盟。冷戰結束使這種同盟失去基礎。同時，美國對華外交中的許多行為也使中共擔心，美國正在發動一場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冷戰，尤其是像考克斯報告這樣的事件，大有無中生有、蓄意製造事端的味道，容易使人認為這是美國發起反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戰爭的信號（張蘊嶺，2001：47）。

除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外，中美兩國的社會意識形態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社會意識形態主要是受文化傳統、生活習慣、社會狀態等因素的影響而形成的，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實際上，官方意識形態與社會意識形態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

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中美兩國最大的差異是宗教意識。馬克思主義是最徹底的無神論，甚至把宗教斥為精神鴉片。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像基督教在歐美那樣占主導地位的宗教。佛教、道教雖然曾一度在中國興盛，

但其影響與基督教在歐美的影響不可比擬。雖然有人把儒家學說看成是一種宗教，但實際上它與宗教還是有很大區別的。歷史與現實因素作用的結果，使得大多數中國人成為無神論者。儘管近 20 年來，中國信教的人有所增加，但仍佔總人口的少數。

宗教意識影響著美國人的思想觀念。王緝思教授認為，美國社會精英的潛意識中，信神的人的德行高於不信神的人；換句話說，信神的人與無神論者在精神上並不平等（王緝思，2000：212）。雖然美國從立國之時就實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宗教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實際上是無孔不入的，宗教自由從一開始即是美國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石。美國政府的決策層及對政府決策有重要影響力的政界、商界要人很多都是教徒，他們的信仰對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政治立場有重要影響，從而使政府的決策時常打上宗教的烙印。中美意識形態還存在著其他許多方面的差異。美國學者邁克爾·亨特在《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一書剖析了三種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白人種族優越；美國偉大；敵視激進革命。

首先是白人種族優越。雖然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是民族的大鎔爐，但卻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白人種族優越論，即白人至上的觀念（托馬斯·索威爾，1992：368）。美國的種族優越論雖不像希特勒的種族理論那樣被公開宣揚，但卻存在於主流美國人的觀念中，體現在美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其次是美國偉大。種族優越感，再加上美國特殊的歷史，使美國主流社會產生了美國偉大的思想。早在美國立國前，托馬斯·潘恩就在著名的《常識》中宣稱：我們擁有使世界重新開始的力量。

最後是敵視激進革命。美國是經過革命而誕生的國家，獨立戰爭實際上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而，在美國卻形成了敵視激進革命的傳統，儘管美國人不像英國保守黨人那樣反對革命。麥克爾·亨特考察了美國人在立國後對世界上發生的若干次較有影響的革命的態度，得出了美國

主流社會是敵視激進革命的結論。對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君主立憲派和吉倫特派、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美國都表示同情和支持；而對1793年後的雅各賓專政、1848年法國六月起義、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則持敵視態度。美國主流社會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傳統，主要是因為美國人喜歡用自己熟悉的標準來判斷是非。亨特指出：美國人用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斐遜曾用過的標準來判斷外國的革命。革命是一個神聖的事情，在進行過程中必須保持最低限度的混亂，要由可尊敬的公民來領導，致力於一個適當的政治目標，並幸運地只是在制定了一部平衡的憲法後而結束。最基本的，革命要保障人權和財產權利。換句話說，一個成功的革命在美國人的頭腦中，無法擺脫地同他們所熟悉的他們自己的革命的方法、目標以及政治文化聯繫在一起。美國主流社會所敵視的革命，基本上都是不符合上述標準的，他們都引起了嚴重混亂，領導者不是可尊敬的公民，政治目標不適當，等等，尤其是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十月革命，與這些標準更是相差甚遠。

與亨特所剖析的美國社會意識形態相對應，中國也存在著一些類似的社會意識形態。首先是對西方的種族優越論和殖民主義的反感。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古代文明，為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過巨大貢獻。然而在近代，中國人民卻遭受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負，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因此對種族優越論和殖民主義極為反感甚至痛恨。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被看成是百年雪恥，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則勾起了許多人對火燒圓明園、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等歷史事件的回憶。

其次是民族偉大和自豪感。中國輝煌的歷史、遼闊的版圖、眾多的人口，使中國人都有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的觀念。中國人是勤勞、智慧的，

中國是個泱泱大國，應該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至少不能由別國來指手劃腳，告訴中國應該怎樣做。中國的命運要由自己來主宰。

最後是對激進革命的認同。雖然儒家的中庸之道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一百多年受欺負、受壓迫的苦難經歷使得中國形成了產生激進主義的土壤。中國革命的成功使激進主義更具有了正統性。這正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極左運動產生的社會基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等信條曾一度為人們所接受。

意識形態（包括官方意識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使得中美兩國主流社會對許多國際事務的認識大相逕庭，如民主、人權、台灣、西藏、干涉主義、人權與主權的關係等。這是影響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

（四）文明的衝突

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將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看成是未來世界國家與地區之間爆發戰爭的主要根源，並特別強調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東方的儒教文明以及伊斯蘭教文明之間的衝突。這種理論雖然有些片面，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杭廷頓並不是孤立的。英國著名學者布瑞恩·彼得漢姆預測 2050 年時世界將形成六大力量中心 - 美國、歐洲聯盟、俄羅斯、中國、日本和印度，形成這六個中心的主要基礎就是文明或文化，世界和平形勢就取決於這六個中心之間的相互關係。他也特別強調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俄羅斯科學院歷史學博士烏特金教授認為：‘歷史退潮’後顯露出的不是繽紛的世界，而是幾種主要文明的對立：西方文明、拉美文明、東歐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和日本文明。它們似乎忘記了過去的歷史和經濟曾使世界經濟和文化融合。固執地保持著各種文明之間的距離，在各種文明之間建立起不可跨越的界線。21 世紀的主要衝突就將在它們之間發生。

文明衝突論並不是沒有根據的。縱觀人類歷史，國家之間的衝突與戰

爭雖然主要是權力政治運行的結果，但文明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因宗教信仰不同而發生的衝突與戰爭不勝枚舉。就是最近幾十年，以宗教為背景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時常發生：中東的以阿戰爭、兩伊戰爭、印尼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徒的流血衝突．．．．．讓英國歷任首相頭痛的北愛爾蘭問題，主要就起因於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對立；僅方圓一公里的耶路撒冷東區聖殿山是巴以衝突的焦點之一，此地沒有什麼經濟和戰略價值，但卻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共同聖地，涉及世界數十億人口的宗教和民族感情。

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東方文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明體系，它們之間的差異甚大，對世界事務的態度和評判標準相距甚遠。就連同一文明體系中的不同支系之間尚且時常發生衝突，截然不同的兩個文明體系間就更容易發生衝突了。更為重要的是，文明影響著中美兩國的社會意識形態甚至官方意識形態。當然，衝突並不是不同文明體系之間關係的主要特徵。隨著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深入，文明的融合趨勢將更加明顯。

（五）中美關係中的熱點問題

上述幾方面的利益矛盾是最深層次的矛盾，構成了中美關係具有對抗性的主要根源，而這些利益矛盾是通過雙方在各種具體問題上的分歧表現出來的。

中美兩國間的問題特別複雜，從性質上看可分為三類：一是涉及中國主權的問題，諸如台灣、香港、西藏、南沙群島等問題均屬此類；二是由意識形態差異而出現的人權問題；三是國家之間正常的問題，諸如貿易爭端、軍控問題上的爭議、環保問題上的不同立場，等等。很顯然，一、二類問題是一般的國家間關係中不會出現的問題。但在中美關係中卻居突出位置。所有這些問題都會被美國用做維護全球和地緣戰略利益的牌。

在第一類涉及中國主權的問題中，台灣問題最敏感、最具爆炸性。另外，美國輿論 1997 年比較關注香港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問題，1998 年炒作的熱點則是西藏，以至於在 6 月 27 日的中美首腦聯合記者招待會上，西藏問題在兩國領導人的公開討論中佔了很大比重。第二類問題，即人權問題，其影響不像台灣問題那麼劇烈，但是非常廣泛而深刻，它在潛移默化中決定了兩國公眾對於對方的長期態度。第三類問題完全依兩國關係的狀況而定，兩國關係好時，完全可以不成問題，而兩國關係不好時，則隨時會被拿出來敲打對方。

二、中美之間共同利益

中共和美國作為兩個最大的國家，在和平與發展及全球化時代，自然存在著許多共同利益，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領域和巨大的合作潛力，這一點就連美國方面也是承認的。柯林頓在 1997 年曾歸納出了需要中共合作的六個方面：、促進一個和平、繁榮及穩定的世界；亞洲的和平與穩定；避免不穩定地區、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其其他精密武器；打擊毒品走私及國際集團犯罪；促使全球貿易及投資盡可能自由、公平與開放；確保不以明天的代價來換取今天的進步（辛華，1998：2 - 7）。這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來看兩國共同利益和合作潛力。從中共方面來說，中共需要美國合作的方面更為廣泛，共同利益更多。

首先，兩國都希望國際局勢最起碼在近期或中期內相對穩定。中共要專心搞建設，希望有和平的外部環境；美國要充當世界的領導，不希望看到一個動盪的世界，它想實現霸權控制下的和平。近些年美國推行新干涉主義，從某種角度說，也是不想讓世界有大的動盪。雖然雙方的動機不同，對和平的理解不同，但在求和平、不希望世界爆發大規模戰爭這一點上是有共識的。

其次，兩國都不想走向互相對抗。在多極化大趨勢下，美國不願與多

強中的任何一強走向對抗。在目前的一超多強格局中，在美中、美俄、美日、美歐等大國關係中，任何一邊對雙邊關係處於對抗狀態，都會使第三者從中漁利，趁勢崛起。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日本和德國的復興，而美國的實力則相對下降，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冷戰的結果是一死一傷。中共要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不願同美國這個「一超」搞對抗。

第三，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擁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地區安全形勢直接影響本地區的發展速度和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地位及受益程度，以及在多極競爭中的處境。歐洲曾為世界中心 200 年，但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歐洲的地位相對下降，北美和東亞都趁勢崛起。亞太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之一，亞太各國都從中分享到了極大的利益，如果亞太動盪，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同為亞太地區大國，都將亞太的安全、穩定、和平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並且有相當程度的共識。比如，中美兩國對朝鮮半島的局勢都非常關切，對 2000 年 6 月南北韓兩國首腦會晤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歡迎。就目前來講，不管出於何種動機，兩國都有為維護地區穩定發揮作用的願望，更不願看到因兩國之間發生衝突而將亞太帶入動盪的深淵。儘管美國與中國在地區安全和地緣戰略上存在著很大的矛盾，但是同整個地區的安全和穩定比較起來，後者牽涉到的利益更為根本一些，不到萬不得已，美國是不會冒與中共一戰而毀掉地區安全的風險的。

第四，在全球化趨勢下，兩國經濟層面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中美兩國經濟的互補性很強，經濟關係已經成為維繫兩國關係的重要紐帶。20 世紀 90 年代，在中美兩國政治關係動盪不定的情況下，經濟關係卻穩步發展；美國國會一再在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向行政當局讓步；在美國國內對華政策大辯論中，企業界成為主張對華接觸政策的中間力量；1999 年 - 2000 年，美國政府同中共簽署了有關 W T O 的協定和國會兩院通

過 P N T R 議案。這些說明，美國在經濟上已對中共有很強依賴性，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共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更大。在兩國的經貿交往中，中共從美國得到的很多都是其他國家不可替代的東西，而美國從中共得到的則是其他國家可替代的。目前，美國已成為中國第二貿易夥伴（有的資料說到 2 0 0 0 年已是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共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1 9 9 6 年，中美貿易總額達 4 2 8 . 5 億美元。據測算，2 0 0 0 中美貿易額接近 8 0 0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2 2 . 5 %，是 1 9 7 9 年貿易額 2 4 . 5 億美元的 3 2 倍多。儘管中美兩國的統計方法和所得數據不盡相同，但雙方的統計結果都表明，在過去的 1 9 年中，兩國貿易年均增長 1 8 % 以上。美國是中共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中共也是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1 9 9 0 年以來，美國對華出口額，雙方統計都是年均增長 1 6 % 以上，大大高於同期美國出口增長速度，居美國對各國出口增長速度的前列。在投資方面，截至 2 0 0 0 年 1 1 月底，美國在華投資項目達到 3 1 0 0 3 個，投資總額為 2 9 2 . 4 1 億美元，協議金額超過 5 9 9 億美元。除香港、台灣地區之外，美國居各國對華投資的第一位。美國最大的 5 0 0 家公司，已有一半以上在華投資。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目前在對外貿易上有 4 0 0 億美元左右的順差，其中 3 0 0 億美元來自對美貿易。另據美國的一項預測顯示，中共加入 W T O 後，吸納外資將會大幅度增長，由近年平均每年吸納 4 0 0 億美元增加到每年吸納 1 0 0 0 億美元左右，增加部份中有相當多的將會來自美國。同時，中美貿易也將有大幅增長。現在，新經濟已經興起，預計新經濟在 2 1 世紀的地位和對各國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重要，而美國則是新經濟的龍頭。所以，美國經濟的狀況如何，直接影響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當然包括中共經濟。有專家認為，發生在東南亞的經濟危機如果發生在美國，恐怕對中共經濟的衝擊更大。同樣，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共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並盡自己所

能參與國際援助活動，贏得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金融危機使美國看到中共發揮到的積極作用，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共要融入經濟全球化大潮，因此必須加入各種國際組織。許多國際組織都是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但中共要加入進去，並準備服從他們的遊戲規則。

第五，在軍事關係上，儘管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加強美日同盟，有針對中共的一面，但是這也有利於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傾向的發展，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傾向的發展也有抑制作用。如果美軍離開亞洲，任憑日本的軍事力量自由發展，那對中共週邊環境的消極影響會更大。

第六，在台灣問題上，雖然中美在統一目標和方式上有矛盾，美國有利用台灣遏制中共的圖謀，希望海峽兩岸長期保持不統不獨不戰的局面，但是中美也有共同點。50 - 70年代，美國在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反對台灣擁有核武器、一個中國等問題上與中共有共同點；現在美國仍然堅持三不政策。1996年夏，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美國就表示反對；布希政府雖然宣稱要承擔保衛台灣的義務，但仍然明確表明支持一個中國原則。美國的這種立場，與公開支持、縱容台灣獨立比較起來，還是應該值得中國大陸歡迎的。尤其是在台灣擁有核武器問題上，中國大陸更需要美國的合作。

第七，在文化交流和社會人士交流上，中共二十多年前對外開放的歷史表明，與西方國家的交流對中國所帶來的好處遠遠大於壞處。在這方面，中國大陸與西方交流的需求大於西方對中國大陸的需求。據美方統計，現在每年有近20萬美國人訪問中國，但卻有更多的中國人在1999年接受去美國的旅遊簽證（據美國駐北京使館的報告，這一年有申請者32萬人，其中21.4萬人獲得簽證）。此外，有大約5萬中國學生在最近一個學年接受去美國學習的簽證。還有，兩國科學家和其他學者進行合

作研究的項目越來越多；到對方國家參加學術會議及考察活動逐漸增加；藝術、體育等方面的交流以及友好城市、省州之間的交流也在增加。

文化交流不僅限於自然科學方面，也包括社會科學。鄧小平說過：我們絕大多數思想理論工作者都應該鑽研一門到幾門專業，凡是能學外國語的都要學外國語，要學到能毫無困難地閱讀外國的重要社會科學著作。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後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說）比外國落後了。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段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篇綱領性文獻中說的，足見在鄧小平心目中，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面與外國進行交流的重要性。

第八，在人權問題上，中共雖然反對美國利用人權問題對其施加壓力，而且認為其對人權的看法與美國有很大差異，但是中共也主張在人權問題上同美國對話。應該說，對話是有基礎的。中美人權現在最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即尊重人的生存、發展及其他重要權利，努力促進人權事業的發展。對種族歧視、種族滅絕等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都持反對態度。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看，社會主義人權觀與資本主義人權觀有一定的繼承性和相容性。

第九，在民主問題上，雖然美國要推行的民主是美國式的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有本質的區別，其意圖是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加強美國國家領導地位，西化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並不是截然對立的，他們也有共同點。首先在基本價值取向有一致性，都反對專制和獨裁。馬克思主義承認資本主義民主是比封建專制進步的東西。馬克思稱美國是最先產生了偉大的民主共和國思想的地方。馬克思主義還高度讚揚了林肯所領導的反對南方奴隸制的戰爭，稱自從巨大的搏鬥在美國一展開，歐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覺到他們階級的命運是同星條旗連在一起的。中共五四時期所倡導的民主應該說是資本主義民主，但中共承認那是

進步的行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這裡的民主也不是社會主義民主。這些都表明，社會主義民主對資本主義民主有一定的繼承性。鄧小平明確說過：民主是我們的目標，當然他指的是社會主義民主，但也絕不是與資本主義完全不相容的。近幾年中共搞村級政權直選，美國的西方國家就大家讚揚，是在向西化邁進。其次在民主實現形式上，雙方有一定的共識。比如普選，鄧小平就曾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這表明他認為，普選並非與社會主義民主不相容。1989年鄧小平對美國總統布希說：美國有一二百搞選舉的經驗。如果我們現在搞十億人的選舉，一定會出現與「文化大革命」一樣的混亂局面．．．．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這裡鄧小平並未否定選舉制度，而是強調中國暫時不具備選舉的條件。在民主問題上，中國可以實現與美國雙贏的結果，既推進了自己的民主進程，又減弱了美國搞意識形態外交的動力。更為重要的是，推進民主進程可以取得西方國家公眾和許多已實行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的同情和支持，有利於中共與西方的民主外交、人權外交做鬥爭。民主搞好了，可以使中共的外部環境大為改善。在民主問題上，中共需要摒棄冷戰思維，不能搞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第十，在科技、環境保護、反核擴散、國際軍備控制、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反國際犯罪活動、反毒品和走私、控制傳染病、反對極端民族主義等問題上，中美之間共同利益更加明顯。

第二節 中日 - 東亞影響力最大

一、中日之間的利益矛盾

中日之間的利益矛盾主要有四個方面：地緣戰略上的矛盾；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的矛盾；文明體系間的矛盾；安全上互不信任的矛盾。就目

前來講，安全上的不信任對中日關係的影響最為突出。

（一）地緣戰略上的矛盾

日本要做政治大國，就要首先在亞洲、在亞太地區發揮主要作用和影響，甚至是成為亞洲的領導者或霸主，而實現這一目標首先遇到的一個障礙就是日益崛起的中共。這是日本政界人士配合美國鼓吹中國威脅論的主要原因。日本列島的地理條件限制了它的發展，東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面是亞洲大陸，領土狹小，資源短缺，外交迴旋餘地有限，向外擴展的餘地很小，對海外市場的依賴性強。自從明治維新後，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理的日本就制定了大陸政策，積極向亞洲大陸擴張，為此發動了一系列的侵略戰爭，並且一度吞併了朝鮮和中國的台灣，並統治中國東北地區，甚至鋌而走險發動了太平洋戰爭，試圖構建由日本領導的大東亞共榮圈。二戰後，日本利用它的經濟優勢，在東亞地區擴大了它的影響。從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就倡導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太平洋經濟圈。90年代又提出了日元經濟圈的構想。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日本試圖利用它的經濟實力來樹立它在亞洲地區的政治領導地位。然而，隨著中共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日本開始認為崛起的中共正在成為它的競爭對手。由於歷史、文化以及在聯合國中的地位等方面的原因，中共在亞洲和國際社會所能夠發揮的政治影響力量遠比日本更具有優勢，而且中國的地大物博和人力資源使得中共比日本擁有更大的經濟發展潛力。

從中共方面來說，中共作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負責任的地區大國，要成為世界格局中的一極，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自己應有建設性作用。中共雖然一再申明自己永不稱霸，但是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不僅反對世界性的霸權主義，也反對地區霸權主義，因此不會接受日本成為東亞地區領導的政治前景和戰略安排。此外，鑑於日本過去的侵略歷史和目前中共國內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勢力的增長，中共必須對日本的發展方面保持足

夠的警惕。

（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的矛盾

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中日之間明顯存在著很大差異甚至對立。在許多涉及到意識形態問題的重大國際事務上，日本都站在西方國家一邊，如參與西方七國對中國的制裁，在人權問題上追隨美國。日美同盟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雙方具有相同的價值觀。1999年5月3日，日本首相小淵惠三在訪美與柯林頓總統會談時就表示，他確認日美兩國是以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權這一共同的價值觀聯結起來的同盟關係。在日本，有相當一部份人認為中共強大了會搞擴張，其主要論據之一就是中共是共產主義國家。大平正芳曾批駁這種觀點說：現在的中國，雖然也講共產主義但又是非常獨特的中國的生存方式；雖說是共產主義，卻又和蘇聯有所不同；一直是以中國式的一種統治概念來治理國家的。可以稱之為毛澤東主義吧！說是共產主義，實際上，可以說是非常中國化了的共產主義。大平的觀點從反面印證了在日本確實存在著共產主義威脅論和反共主義思潮。1999年3月北約開始空襲南聯盟後，日本對北約的行為表示理解，可見它與北約在價值觀念上的一致性。不過，與美國比較起來，日本對華政策中的意識形態色彩要淡得多，可以說，日本是西方國家中最不重視意識形態因素的國家。正因為這樣，1989年北京風波之後，日本率先打破了西方對中共的制裁。

（三）文明體系間的矛盾

杭廷頓在按文明體系給國家歸類時將日本說成了是無法歸屬任何一個文明系統的最重要的孤獨國家，這表明了日本在文化上的兩面性、獨特性以及它所面臨的文化困境。日本雖然曾深受中華文化的長期影響，但經過一百多年的西化，已經脫離中華文化圈，自成一體。儘管日本文明與中華

文明之間的差異要比基督教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的差異小得多，但畢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別，這就促使雙方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都存在著基本價值觀念的差異。

（四）安全上的不信任

在中日關係中最能牽動雙方警惕性和注意力的恐怕還是還是安全問題。在這一敏感的領域，中日之間最大的問題是互相猜疑、互不信任，誰都無法把自己的戰略設計建立在對方所公開宣示的戰略意圖和政策方向的前提下。中共警惕日本會成為軍事大國並重走軍事擴張的道路，日本擔心中共的強大是否會形成中國威脅，因此造成了雙方在軍事安全問題上的戒心甚至敵意。

日本的具有小而精特點、用高技術裝備起來、高素質的現代化軍隊 - 自衛隊，不能不是中共在安全上憂慮和警戒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的軍事力量之所以令人擔憂，首先在預期不斷增長的高額軍費。根據2001年度財政預算，日本防衛開支為49550億日元。根據《日本2000 - 2005年度中期防衛力量裝備計畫》，在2001 - 2005的5年中，日本的軍費總額累計將達25.16億萬日元，年均在五萬億日元以上，約合500億美元，超過了東亞地區其他所有國家國防預算的總和。儘管日本的軍費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不足1%，但其絕對金額卻僅次於美國而居世界第二位，使日本有足夠的資金用於軍隊的現代化。而且國際軍事問題分析家普遍認為，日本的防衛費中不包括退伍軍人的養老金、航空航太技術開發費用、軍事科技研究開發費用、海上保安廳費用等，如果按照北約的標準把上述這些費用全部包括進去，日本的防衛費將佔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5%。

其次是日本自衛隊的現代化與高科技化，特別是工業生產的發達和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進步，使日本擁有強大的軍事工業生產能力。日本

的新型雷達能夠探測 360°範圍內的任何目標，為世界首屈一指，難怪美國三番五次要求日本轉讓雷達技術。日本在製造武器的基礎材料方面，也居世界領先地位。製造尖端高科技產品，需要重量輕、質量高、耐熱、耐冷、耐腐蝕、牢固而韌性好的材料，日本鋼鐵製造業開發的鈦鎢硬質合金就是這一類的產品；而日本生產的製造新式飛機所必不可少的碳纖維樹脂，已達到世界市場佔有率的 50%。日本生產的半導體元件和晶片，更是現代化電子信息戰的物質載體 - 電子計算機 - 的大腦和心臟，就連美國高科技軍功產品的電子指揮控制裝置中所用的 95% 的半導體元件，都是日本產品。日本還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造船大國和汽車生產大國，如果是在戰時動員體制下，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龐大的汽車和船舶生產能力轉化成坦克和軍艦的生產能力。此外，日本已經能夠發射自製的人造衛星，擁有了發射大型運載火箭的技術和能力；日本還擁有幾十座原子反應堆，能夠生產並儲藏帶量可以用於製造核武器的核材料。目前，擁有強大軍工生產能力的日本完全有技術和力量製造遠程導彈與核武器，是否需要或有必要進行核武裝，基本上只是一個門檻很低的政治決斷和主觀意志問題。總之，日本雖然沒有專門的軍工生產部門，武器裝備的生產全部委託給 2000 多家民間企業，但如今在高科技領域，軍用技術與民用技術的界線早已經無法截然分清了，所以如果說日本擁有一個工藝技術先進、生產潛力巨大、產品門類齊全的軍工科研開發和生產體系，一點也不為過。

日本巨大的軍事實力和巨大發展潛力是一個現實的存在，實際上日本已經是個非核武裝的常規軍事大國。如果日本能夠始終如一地恪守和平憲法，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即使發展有限的軍事力量，也不至於引起外界和周邊國家對它的疑慮和警惕。然而，現實情況卻令人擔憂。日趨外向的軍事安全政策、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難以把握的國內政治走勢等因素，都不能不使人擔心日本將來會如何運用它的巨大軍事力量和軍工生產潛

力。一進入 21 世紀，日本就在謀求成為 21 世紀軍事強國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步伐。一是日本國會的一些議員利用實施中央省廳的行政改革之機，公然提出要把日本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實際上就是想趁機設立名正言順的國防部；二是在 21 世紀到來前夕正式提出設立有事法則，試圖在修改憲法前使日本的軍事力量發展和對外使用武力更具法律依據，而首相森喜朗對有事法則的積極態度尤為引人注目；三是日本政府於 2001 年 12 月中旬批准了一項旨在用一些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來裝備其軍隊的耗資 26 萬億日元的五年計畫，其中包括購買空中加油機和向導彈防禦體系投資，這將改變日本自衛隊的純粹自衛態勢。如果聯繫起日美同盟的矛頭針對著中共，以及《週邊事態法》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模糊態度，日本的這些動向就更不能不讓中共警惕。

當然，日本方面對中共的政策走向也存在著某種擔心和疑慮。主要是日本認為，中共是位於日本週邊地區、而且擁有核武器的強大軍事力量，特別是中共宣佈的國防算有相當大隱匿部分，而且明顯表示出今後將繼續漸進性地推進國防現代化的姿態，這對日本的安全利益構成直接影響。此外，日本還對中共擴大海洋活動範圍的動向存有疑慮。

上述中日之間的利益分歧和矛盾是深層次的，他們決定日本對華政策存在著遏制的一面，中日關係難免有摩擦。這是進入 90 年代以來中日關係不如以往和諧的根本原因。而中日之間存在著的一些遺留問題又使得兩國關係更加複雜，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和台灣問題。

首先是歷史問題。對中日關係而言，歷史問題儘管是 50 年前的事，但又不能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尤其是近年來，日本國內少數否認和美化侵略歷史的言行越演越烈，使歷史問題在 50 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影響著中日兩國在戰略利益、戰略關係上的判斷和選擇。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鐵證如山，任何一個稍具理智、不懷偏見的人都不會無

視那血與火寫下的慘痛歷史。因此，中日兩國之間關於歷史問題的矛盾摩擦在本質上又是一個如何正確認識歷史事實的問題。對此，國際社會早已達成政治法律共識和基本的行為準則，中日兩國都必須依照國際社會和全人類的共同標準，認識和看待兩國之間那段不應被忘卻、也不應再重複的歷史。否認或美化侵略歷史，是對曾經遭受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亞太各國人民的侮辱，是對世界和平、人類尊嚴和國際人權準則、人道主義精神的背叛，也是對擁護和平民主、推崇自由平等的日本國民良知的嘲弄。德國總統馮·魏茨澤克1995年8月訪問日本時說過這樣異常發人深省的一段話：自19世紀末以來，日本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鄰國，同時在那裡擴張自己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毫無疑問，曾有日本軍隊出現在它國土上的亞洲各國人民，在評價這些政治事件和佔領時期日本的作用上是相當一致的，這不是一個僅具有過去意義的事，而是一個具有極為現實意義的事實。因為，誰不願意分析自己的歷史，誰就不會理解他今天的處境和為什麼如此。誰否認過去，誰就有重蹈覆轍的危險。對中國方面來說，日本少數人否認侵略戰爭甚至美化侵略歷史是一件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大事。就政府層面來說，雖然日本政府曾經就歷史問題在口頭上對中國表示過道歉、遺憾、反省、痛心，但是正如朱鎔基總理在2000年10月訪日期間與日本公眾對話時所說的那樣，日本政府從來未對中國有過書面的正式道歉。

其次是領土問題。釣魚台問題是中日兩國之間存在著的領土主權爭議問題，這一問題目前雖然尚未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局，但卻是導致兩國間摩擦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稱釣魚台為尖閣群島，它位於台灣東北1000海裏處，由幾個小島和岩礁組成，是我國的固有領土。1984年11月，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秘密竊取了釣魚台；1895年1月，在簽署《馬關條約》之前，日本內閣決定先行將釣魚台劃歸沖繩所轄，建立標樁。194

6年1月29日，聯合國軍最高司令部發布了佔領日本的訓令，其中所提到的日本領土並不包括釣魚台。1969年11月，美國在將沖繩歸還日本時，別有用心地將釣魚台及其附近島嶼也劃歸日本沖繩縣。日本據此認為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於是該島成為兩國爭執之地。1972年，在恢復邦交談判過程中，在舉行第三次兩國首腦小範圍會談時，曾涉及釣魚台問題擱置起來，留給子孫們去解決，他們會比我們聰明，會找到好的解決辦法。後來還表示過，那裡的海底石油可以共同開發。這就是中共處理釣魚台問題的一貫立場。

日本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戰略是穩定同中共等週邊國家的關係，以利於集中精力同俄羅斯爭取歸還北方四島。在北方四島未收回的情況下，日本不願在釣魚台問題上過分刺激中共。但是日本方面卻經常在暗中搞一些小動作，以便通過軍事控制和時效取得造成該島屬於日本的既成事實。1978年日本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在該島修建了一座燈塔，以顯示日本主權；1988年又開始修建新燈塔，自設計階段起便得到海上保安廳的指導，1989年6月保安廳還派遣負責官員赴島檢查，後因日本政府擔心刺激中國大陸和台灣，因此對日本青年社的申請久拖未批。1992年，中共通過領海法，將釣魚島列為中共領土後，日方稱釣魚台為其固有領土，並向中共提出抗議。1996年下半年，日本政府宣佈實施200海浬的專屬經濟區，把釣魚台也包括在內；與此相適應，日本右翼團體積極活動，製造釣魚台是日本領土的聲勢。7月15日，日本青年社成員登上釣魚台的北小島，豎起一座高5米、重210公斤的巨型太陽能電池式鋁合金燈塔。他們向日本海上保安廳申請，得到批准，將此作為航道標誌。8月上旬，日本青年社和尖閣列島防衛協會（沖繩縣一右翼團體）成員，先後兩次登上釣魚台主島，進行了設置大型太陽旗等活動。9月9日，日本青年社因7月15日所建燈塔被颱風刮倒，再次登上北小島，重新建

起了一個規模與原來相同的燈塔。這些由右翼團體出面以民間行為進行的活動，實際上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縱容和支持，並且有政府要員與之相配合，稱釣魚台就是日本領土。日本外相就曾在香港公開聲稱釣魚台是日本固有領土，沒有特別加以說明和解釋的必要。由於中共官方進行了堅決有利的鬥爭，迫使日本政府在1996年10月下院大選後向中方表示：它既不參與右翼團體的活動，也不批准其為正式燈塔。釣魚台事件暫告一段落。

最後是台灣問題。這是中日關係中最為敏感的問題之一。日本曾統治台灣50年，對台灣有著特殊的感情。至今日本仍然有人堅持台灣歸屬未定論，他們只是說只有一個中國，但從不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88年，一位日本前駐華大使發表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說：日中正常化時存在小異的問題之一是台灣問題，中共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尊重中共的立場。然而，理解、尊重與完全承認並非一碼事，日本稱要堅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其中只寫有應履行開羅宣言的條款，因開羅宣言發出時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寫的是應歸還「中華民國」。日本因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放棄了台灣、朝鮮半島、南樺太(庫頁島)和北千島的主權。日本的主權被扭掉了手足，只剩了軀幹。台灣因日本戰敗而被戰勝國扭掉，所以即使讓日本說這一扭掉的東西是誰的，赤身裸體的戰敗國也無表態的權利。我們放棄了權利。按照這位官員的說法，雖然日本放棄了對台灣的主權，但台灣不一定要歸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好像台灣並不是中國所固有的領土，而是戰勝國從日本那裡剝奪來的。這種論調表明，日本一些人仍然對台灣抱有野心。

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日本政府曾表示不與中華民國發展官方關係，而只是在民間層面上與台開展經濟、文化交流，外務省也努力對中共做出這種姿態。但是實際上，日台交流的管道在暗中不斷擴大。進入20世紀9

0年代後，日台交往更是明顯發展，越來越具有准官方性質。1991年，日本外務省首次決定派課長級官員以長期休假方式出任駐台交流協會總務部長，並允許副部長以下官員以私人身分與我國接觸。1992年，日本先於美國兩年正式同意將我國駐日本的亞東關係協會易名為駐日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1993年2月，我國外長錢復以觀光名義訪日，並與日本自民黨要頻繁接觸，其中包括自民黨前幹事長小淵惠三、前副總裁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這是我國外長的首次訪日。隨後，一些日本官員對台灣進行了訪問。1994年廣島亞運會期間，日本政府不顧中共的反對和中方的一再交涉而同意我國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訪日，使日台交往規格近一步提高。

日本之所以不露聲色地積極發展對台關係，一方面與中華民國所開展的彈性外交、實質外交的攻勢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在於日本政局的變動以及外交戰略的調整。在日本政界一直有一股力量不小的親台勢力，並主要集中在自民黨和民社黨內，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任何一屆日本內閣都不能不在日台關係問題上慎重行事。90年代以來，日本政局多變，內閣相對比較軟弱，難以抵制親台勢力的攻勢。蘇聯解體後，美歐與台灣的关系都有所升溫，1992年布希總統宣佈對台出售F-16戰鬥機，法國也對台提供幻影-2000戰鬥機，對台關係越走越遠。日本在對華政策上與美國有很強的一致性。另外，90年代以來，日台經貿關係日益加深。據日本官方統計，1993年日本對台出口221億美元，是對中國大陸出口(173億美元)的1.27倍，日本對台出超124億美元。1994年，日本對台出口上升到228億美元，出超131億美元。日本對台投資已超過美國，成為對台的第一投資大國。巨大的經濟利益也是日本重視對台關係的重要因素。不過，影響日本對台政策的最為重要的因素還是特殊的台灣情結的充分表露。

台灣問題既涉及到安全問題，也涉及到領土和主權問題，儘管中共媒體對歷史問題更為關注，但從發展的眼光看，台灣問題才真正是關乎中共戰略利益的重大問題，最終將很可能發展成中日兩國之間最大的潛在危險因素。目前，日本政府堅決不肯認同美國已經公開宣示的三不（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和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加入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也不肯明確表示日美聯合防衛指針的適用範圍不包括台灣，政府各省廳已將訪問台灣的官員級別放寬到局長一級，由國會議員組成的日台議員懇談會擁有200來名議員，占日本國會議員總數的40%以上，日本的親台勢力也一直沒有停止過邀請李登輝訪問日本的活動。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借助台灣問題對中共進行戰略牽制的潛在意圖已經日趨明顯，而這一政策意圖的戰略思考顯然符合日本國內親美派的外交理念。親美派目前在日本政府及各界佔據主流地位，他們主張依靠美國的保護來發展日本，借助美國的力量來提升日本，他們不主張與中共對抗，但希望誇大中共的威脅使美國遏制中共，試圖刺激中共與美國展開高技術條件下的軍備競賽，使中共更被迫走上高成本、數量型的軍備擴展道路，從而抑制中共的經濟增長和國力增強，甚至希冀中共重蹈蘇聯解體的前車之覆。借台灣問題牽制中共，靠美國力量抑制中共，通過控制中共的發展保持日本與中共國力對比的優勢，大體上就是這一派的主要戰略思考和策略方針。

此外，也不能完全排除日本對台灣抱有領土野心。就像薛君度所分析的那樣：如果台獨勢力鋌而走險，很可能會爆發危機，這又可能給予日本侵華的機會。因為日本有識之士，究不能與極右派抗衡也。如果聯繫起當年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和侵佔台灣的歷程以及現在的周邊事態法案，薛先生的分析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上述這些因素的存在和發展雖然一時還不會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局，但是隨著日本走向政治大國進程的加快和中日之間利益關係的變化，它們將

可能成為誘發中日之間衝突和摩擦的敏感點。

二、中日之間之共同利益

在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中日關係的利益基礎和出發點、立足點是什麼？兩國之間還有沒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答案自然應該是肯定的，對於這樣兩個相鄰的大國來說，沒有共同的戰略利益是不可想像的，也是不符合客觀現實的。中日兩國的共同利益或利益重疊主要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第一，地緣戰略利益。中日兩國比鄰而居，誰也無法改變這一現實，重新選擇鄰居。但是雙方誰都可以選擇與鄰居相處的方式。同處於一個政治經濟的戰略空間之內的地緣關係，使得雙方的利益關係不能不錯綜複雜地交織和滲透在一起，形成某種程度的利益共同體。和則兩利、鬥則俱傷，雙贏與互利應該成為兩國對雙邊關係進行戰略思考和政策調整的基本出發點和主要目標。

第二，地區戰略利益。中日兩國都是亞太地區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大國，理應加強合作，為建構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形成公正、合理、平等的地區政治經濟新秩序發揮積極的、負責任的建設性作用，促進地區的政治多極化和經濟一體化。中共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為了國內經濟現代化建設致力於維護週邊和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儘管不能否認或無視日本政府目前正在藉口局部地區緊張局勢而加緊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政策和行為，但 20 世紀的國際關係史已經清楚地講明，日本只有在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中，才能保持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才能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中共與日本各自的和平與繁榮，以及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是雙方共同利益之所在，而且也只有和平穩定的地區秩序中，兩國自身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維護和充分發展。

第三，發展戰略利益。中日兩國分別是亞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

國家，經濟上的雙邊互補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共堅持以經濟現代化建設為中心，需要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要爭取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日本謀求進一步發展經濟和擴大國際政治影響，離不開中國的理解和支持。到2000年，中日貿易超過700億美元，日本對華直接投資220億美元；日本是中共最大的經濟夥伴；中共國際貸款的70%是來自日本的，中共固定資產投資30%來自日本。隨著中日經貿往來的不斷增長，兩國間已經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和則兩利、鬥則俱傷的利益共存關係，都需要通過進一步加強和擴大經貿合作與交流來實現彼此的互利、雙贏和共同發展。但兩國之間巨大的經濟互補優勢卻因為近年來雙邊關係的動盪和反覆而未能充分發揮出來，兩國還未能以充分的雙邊經貿合作為東北亞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2000年11月，在東盟+中日韓（10+3）的首腦會晤中，中共總理朱鎔基提出了東北亞地區經貿合作和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新構想，表示出積極推進地區經濟合作的願望。今後，在10+3的框架下開始和推進中日、中日韓、東北亞與東南亞的經貿合作，建立地區性自由貿易區和共同貨幣體系，將是中日兩國通過謀求地區共同發展以促進雙邊關係發展的適當方式和有效途徑。

第四，安全戰略利益。冷戰後，亞太地區出現了不安定因素擴散化和不確定化，以及雙邊安全同盟擴大化的特徵，這顯然並不符合地區內各國尋求多邊安全機制以維護和平與穩定的趨勢。無論是維護地區安全，還是解決跨國家的環境、走私等國際性問題，都需要包括中日兩國在內的亞太地區各國和國際社會的合作。中日之間在有關安全問題的各個方面，如：提高軍事政策透明度、建立互相通報制度、軍事人員和軍艦互訪以及開展海上救援和預防性外交等，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兩國在安全領域的合作相對落後的局面也有所改觀。在今天這個謀求和平與發展的世界，輕易

把別國看做威脅，只會庸人自擾地給自己製造出新的威脅；使別國感到不安全，自己也就得不到安全。對中日這兩個有著歷史恩怨的鄰國來說，通過安全對話與合作，建立基本的互信任體系，在保障地區安全的多邊框架之內求同化異，實現共同安全尤其顯得必要。

第五，全球戰略利益。中日兩國對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看法並非毫無接近之處，兩國都反對一國獨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都要求世界事務由世界多國共同協商解決，都主張發揮聯合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的權威作用。儘管中共主張的是各國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多極世界，日本希望的是美日歐等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但在反對單極世界和一國獨霸的利益訴求方面，還是有互相重合的部分。日本關於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戰略構想本身，在客觀上對於美國的一國獨霸戰略，也並非毫無牽製作用。單從日本方面來說，日本要成為世界政治大國，不能無視中共的國際作用；要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必須得到中共的合作。日本若想在亞太地區發揮主導作用，就必須抗衡美國的影響，擺脫美國的控制，因此也需要借重中共來牽制美國。

總之，就中日雙邊關係而言，兩國誰也無法否認對方的客觀存在和現實利益，無法否認對方的存在與己方利益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廣泛而深刻的互動關係。對於中共來說，日本是最大的對外貿易夥伴，是海外資金和技術的主要來源之一，是對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影響最大、最直接的鄰國，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可資利用的主要外部資源之一。因此對日外交是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共對外關係和國際戰略的全局中佔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與日本保持長期穩定的睦鄰合作關係，無疑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對於日本來說，對中共的外交僅次於作為其外交基軸的對美外交，是日本立足現在面向未來、立足亞太面向全球的大國未來志向型外交的兩個車輪之一。如果對中共的外交處理不好，將

會使中日關係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處於間歇性的緊張和對立之中，不僅將導致日本的政治大國外交在戰略方針上失衡、在政策策略上失誤，也將使日本無法得到最基本的周邊安全環境和經濟發展條件，無法把主要資源和精力投入面向世界展開的全方位外交，從而無法實現其成為世界大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目標。

中日兩國之間這種在戰略利益上的互為依存、互相重合，決定了中日兩國在戰略上某種程度的互相認同以及互相合作的必要性。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就是這一戰略認同和戰略合作在兩國關係的政治理念以及利益訴求上法律化、條文化的成果。冷戰結束後的1998年，中日兩國發表聯合宣言，作為規範中日關係的第三個綱領性文件，總結過去、面向未來，明確了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雙邊關係的全新定位，為兩國跨世紀的國家關係奠定了政治基礎和理論框架。尤其重要的是，日方首次同意把侵略、中國只有一個等文詞寫入聯合宣言，使之條文化，不能不是中共對日外交的重大突破和明顯成果。與此同時，聯合宣言做為指導中日關係發展的基本原則和大政方針，又為中日兩國在戰略利益的部分認同和理性認識的基礎上，如何處理現存各種矛盾和摩擦問題，提供了一個在雙邊關係的發展中解決各種問題的新思路，即把擴大交流與合作同解決矛盾與摩擦結合起來，在開展合作、擴大交流的進程中推進各種矛盾和摩擦的緩解、化解，避免雙方矛盾激化到衝突或對抗的程度。為此，中日兩國一致同意在涉及到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加強聯合國維護世界和平的作用、削減和銷毀核武器、防範地區金融危機等多個方面的國際事務中，在國際政治、經濟以及全球性問題等領域加強協調與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以及全人類的進步世界做出積極貢獻，雙方還簽署了33項合作與交流協議。在近現代國際關係史上，中日兩國在一次國事訪問中簽署如此之多的合作協議、達成如此之多

的合作項目，是不多見的。2000年5月20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北京就中日關係發表了重要講話，再一次強調了中日關係應該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的基本原則，強調要從兩國人民及子孫後代的根本利益出發，從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要求出發，以高瞻遠矚的態度來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

當年10月，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問日本，與日本國民直接對話，進一步推進了兩國國民之間的信任與相互瞭解，有力地促進了雙方在政治、經濟、安全、科技、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的合作與交流。同時表示：我們歡迎日方在促進地區經濟均衡發展，提高亞洲整體經濟實力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我們可以在‘10+3’的框架內積極探討兩國、中日韓之間以及三國與東盟的合作，從而提出了包括雙邊、三邊以及多邊三個層次、三種範疇的地區經濟合作構想，提出了通過地區多邊合作穩定中日雙邊關係，以良好的中日關係促進地區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思路。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也表示：日本願意繼續在10+3框架內推動東北亞區域合作，並願意就此加強與中共的協調與配合。顯然，中日兩國領導人都已認識到，中日作為亞洲最大的兩個國家，必須超越雙邊關係的侷限，共同思考如何為地區經濟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和穩定無疑將有助於東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反過來也將為中日關係的發展和穩定提供有力的外部環境和積極的推動因素。

上述通過雙邊關係的發展解決各種問題與雙邊、三邊與多邊的多層次、多元化的區域合作互相促進的兩個新思路，是中共外交理念在中日關係和地區合作問題上的一大突破，是具有長遠意義的戰略構想和行為模式。如果中日兩國能夠通過經濟合作達到雙贏和互利，並推動東北亞地區區域經濟發展的多贏和多利，進一步促進亞太地區經意的整體提升與共同進步；而中日關係也在地區經濟合作與發展的大趨勢下，和諧穩定正常發

展，將是一種最理想的、最有益的結局。

第三節 中美日 - 既競爭又互補的三角關係

儘管目前並不存在一個形式嚴謹、規則明確、運作規範的中共、美國、日本三邊互動機制，但亞太地區大國關係的戰略性調整和各國對外政策的制定，無一不是以對方的外交政策和國家行為作為參照的，從而在實際上形成了具有地區性戰略影響的三角關係，並作為一個整體以其運作和演變左右著亞太地區的國際戰略格局。因為在客觀上一國對外政策和戰略方針的調整，都必將對另外兩國的政策策略或戰略方針的選擇產生不容否認的影響，而且在主觀上，三國也都具有明確的三角互動意識，任何一國在制定或或實施對外政策和國家戰略時，都不可能不考慮將會對另外兩國產生的影響以及因此而導致的後果。冷戰結束以來，中、美、日三國之間戰略關係調整的頻率加快、力度加強、幅度加大，明顯地表明中美日三國利益相互依存、互相滲透，三對雙邊關係相互制約。中美日三角關係正在新的基礎上得到調整和發展。

一、錯綜複雜的中美日國家利益

與亞太地區其他幾組三角關係（中美俄、中日俄、美日俄）相比，中美日三角關係的利益結構尤為複雜，三國之間在國家利益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幾乎所有方面都存在著競爭與合作、衝突與協調的互動關係，正是由於這種共同利益與衝突利益交織在一起的複雜關係，使得三國都很難簡單而明確地確定彼此之間的戰略關係和利益邊界。

美國的亞太戰略目標是要建立以美國為首的新太平洋共同體，以美國與部份亞太國家的雙邊安全機製作為骨幹，形成美國操控下的亞太地區安全網路；以亞太大市場作為保障美國經濟持續發展、穩定增長的重要依

託；在亞太地區建立以美國的民主、人權為標準的泛地區價值觀念體系；通過歐亞平衡的全球戰略建構美國統治下的和平。1992年2月，美國國防部擬定了《1994 - 1999年防務計畫指針》，提出美國在冷戰後時期的基本目標應該是，維持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防止在歐洲和亞太地區出現對美國的至高無上地位提出挑戰的任何全球性對手。該指針毫不隱諱地將美國的全球戰略意圖明白無誤地公告天下。

日本力圖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後盾，以全方位的大國外交為手段，不斷擴大對於國際事務的政治影響力以及參與權和發言權，從亞太地區逐步走向全球，最終當選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實現政治大國的國家發展目標。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共正在全力進行經濟建設，希望通過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保障有利於國內經濟現代化建設的外部環境，把握住冷戰結束和亞太地區崛起所提供的歷史性機遇，實現中華民族的騰飛和中國的崛起。

各自的戰略目標，決定三國有不同的戰略利益。而三者的戰略利益肯定有矛盾、衝突的地方。美國的全球和亞太戰略決定它要盡力阻止其他大國的崛起，這樣中共和日本都成了美國防範的對象；日本要成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與美國和中共都有某種程度的競爭；中共要實現現代化，成為世界多極格局中的一極，必然對美國和日本的戰略利益構成某種衝擊。

除了戰略利益外，中美日之間還存在著其他許多方面的二對一利益矛盾。

（一） 美日 - 中共

1．安全利益的衝突。日本對中共的崛起，特別是國防現代化存在著安全上的疑慮；美國認為中共強大後會威脅美國在亞太盟國的安全。

2．地緣政治利益矛盾。美國認為崛起後的中共會挑戰它在亞太地區

的地位；日本將中共看成是它成為亞洲霸主的主要障礙。

3．意識形態對立。美日都是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與中共處於對立狀態。美日同盟的重要基礎之一就是共同的價值觀。

（二）中日 - 美國

1．政治利益矛盾。美國要構建單極世界，而中共則主張多極化，日本要成為政治大國，客觀上也贊成多極化。

2．文化利益矛盾。中美在文明、文化體系上差異較大。日本雖然在文明體系上是介於東、西之間，兼有東方文化和歐美文化的特點，但它畢竟是地處東亞，與中華文明有著上千年的淵源關係，與中國同文同種，而且現在正致力於脫美入亞，因此與美國的差距大於與中共的差距。

（三）中美 - 日本

1．政治利益矛盾。中美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成為世界政治大國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必然會分割現有常任理事國既得的權益。

2．安全利益矛盾。中美歷史上都曾吃過日本軍國主義的苦頭，並且一度聯手抗日。現在中共對日本走向軍事大國以及軍國主義復活存有很大的疑慮，美國的這種疑慮雖然極小，但它也不願看到日本在軍事上過於強大。美國宣稱美日同盟起著限制日本軍事力量發展的瓶塞作用，不是沒有任何道理。

上述的利益矛盾和衝突決定了中美日三角關係具有競爭的性質，這與70 - 80年代在共同對付蘇聯的一條線上的中美日關係具有質的區別。

然而，冷戰後的中美日三角關係又不完全是競爭關係，與二對一式的對抗三角關係，如70 - 80年代中美蘇三角關係（中美 - 蘇聯）和50 - 60年代中美日三角關係（美日 - 中共），有很大的區別。這主要是因

為中美日之間還存在著很多共同利益。

從上述三國之間的利益矛盾可以看出，在每一項二對一的利益矛盾中，又都存在著這二者之間的共同利益。矛盾利益與共同利益互相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多極化時代，在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下，中美日之間還存在著三方共用的共同利益。

首先是經濟利益。在發展這個大潮流下，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將發展本國經濟作為頭等大事，美日也不例外。冷戰後，儘管美國處於一超獨霸的地位，而且經濟形勢又非常好，但是它也不敢在發展經濟上有所怠慢。美國歷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將擴展美國經濟作為三大目標之一。為此，美國就必須重視中國這個新興的大市場，絕不會為了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利益而將之拱手讓給它的經濟競爭對手 - 歐盟和日本。對日本來說，中國市場的吸引力更大。這正是近年來在中共與美日的政治關係齟齬不斷的情況下，經濟關係卻越來越密切的原因所在。存在強大反華勢力的美國國會最終能夠通過關於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的議案，非常能說明問題。這表明在美國決策層的心目中，經濟利益遠遠高於意識形態及其他方面的利益。此外，世界各國尤其是美、歐、日之間日益激烈的發展競爭還削弱了美日反華勢力發動意識形態冷戰的基礎，遏制中共的政策就一直沒有得到歐盟國家的響應，而沒有歐盟的響應，對華冷戰是搞不起來的。隨著全球化的深入，中美日之間共同經濟利益只會越來越增大，而不會縮小。

其次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局面。和平已成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業和崇高願望，任何國家的政府在制定對外政策時，都必須考慮本國和世界人民的這一願望。在和平這個大潮流下，像 20 世紀以前那種殖民戰爭和 20 世紀中葉德、日、意法西斯發動的強佔它國領土的侵略戰爭已經沒有

發生的基礎和條件。這正是當今世界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能和平共處於一個地球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在越南、蘇聯在阿富汗的失敗很能說明問題。並不是美、蘇的實力不夠強大，而是它們的侵略行為違反了本國和世界人民的意志。當今的美國再強大、霸道，也不敢強佔別國領土，頂多只能對那些所謂死硬的無賴國家進行某種形式的打擊，破壞其軍事、經濟設施，削弱其力量，僅此而已。而且這種打擊也僅僅是針對一些能被它抓住把柄的小國，對像中共這樣既在國際上有很高的威望又具有相當軍事實力特別是擁有核武器的大國，它絕不敢輕舉妄動。而日本作為一個受和平憲法約束的國家，在軍事行動上只能是躲在美國的後面。

第三是在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全球化在使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度增大的同時，還使全球性問題增多。而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並不是某一兩個大國所能為的，必須有世界各國參與，特別是所有大國的能力合作。比如在核擴散、環保等問題上，美國必須與中共這樣一個大國合作。

第四是文化交往的利益。杭廷頓預言文明的衝突將主導未來的國際關係。那麼，為了避免文明衝突這種結局出現，各國特別是處於不同文明體系的國家進行文化交往，增進瞭解和理解，則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不同的文化體系都有各自的長處，它們只有互相學習、借鑑，才能不斷吸收新鮮養分，增強生命力，這也需要交流、交往。保持國家間的良好關係，無疑有助於文化交往，而對抗、對峙只能阻礙這種交往。

第五是多極化趨勢下的共同政治利益。多極化是個大趨勢，美國和日本的戰略家們也都承認這一點。中美日都極有可能成為未來多極世界的一極。誰將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佔據有利的位置，關鍵看 21 世紀前幾十年的發展綜合實力對比。對美國來說，現在雖為一超，並極力想阻止其他幾強挑戰它的地位，但是它並不想與任何一強走向對抗，因為那樣既影響自

己的發展，又會使其他幾強趁勢而起。中、俄、歐、日都是美國要防範的對象。對日本和中共來說，雙方既不願走向相互間的對抗，更不想與美國這個一超對抗。

第六是亞太地區的共同安全利益。地區安全形勢直接影響本地區的發展速度和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及受益程度，以及多極競爭中的處境。歐洲曾為世界中心 200 年，但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歐洲的相對地位下降，北美和東亞趁勢崛起。亞太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之一，亞太各國都從中分享到了極大的利益，如果亞太動盪，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中、美、日同為亞太地區大國，都將亞太的安全、穩定、和平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並且有相當程度的共識。比如，三國對朝鮮半島的局勢都非常關切，對 2000 年朝韓兩國首腦會晤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歡迎。就目前來講，不管出於何種動機，三國都有為維護地區穩定發揮作用的願望，更不願看到因三國之間發生衝突而將亞太帶入動盪的深淵。儘管美日與中共在地區安全和地緣戰略上存在著很大的矛盾，但是與整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比較起來，後者所牽涉到的利益更為根本一些，不到萬不得已，它們是不會冒與中共一戰而毀掉地區安全的風險的。

總之，中美日之間雖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利益矛盾和衝突，但是也有維繫三邊關係並促使之向前發展的重要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全球化、多極化等世界大勢及亞太安全利益的影響下，共同利益將越來越明顯和重要。正是由於既有利益又有利益重疊，中共與美日的關係才定位為將來時的夥伴關係，即非敵非友。在某些方面，是對手甚至敵人；而在另一些方面，則是朋友；但總體上則是夥伴。夥伴能否演變成敵人，取決於三國各自的外交戰略走勢和世界大勢。就目前的態勢來看，在幾十年內，中共與美日成為敵人並重歸冷戰對抗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還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與美日的夥伴關係都是將來時的，能否實現，

也取決於三國各自的外交戰略走勢以及外交政策的實施。但是，各方面能提出這樣的目標，就表明各方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了相互間的共同利益，即使布希政府否定了柯林頓政府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的定位，但也未否認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它的競爭對手的定位並不同於敵人，也是非敵非友或亦敵亦友。同時，將夥伴關係這個定位設為將來時，也表明各方都承認相互間的利益矛盾和分歧。當然，與夥伴相比，競爭對手更強調利益差異和矛盾，而夥伴則更強調共同利益與合作。不過，布希政府的競爭對手定位雖然更突出了中美之間的利益矛盾，但是也如實的反應了中美關係的現狀。競爭對手究竟會朝那個方面發展，是變成夥伴還是敵人，則取決於國際大勢、雙方的外交戰略和力量對比、影響中美雙邊關係的外部力量等諸多因素的變化，特別是雙方是否真的致力於朝夥伴方向努力。

第四節 小結

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有了一定的結果之後，另一項發展的課題就是中共走進國際世界，而國際各國也樂見中共走進國際世界體系中，那表示中共將受國際體系的約束，不再出現脫離國際規範。對於中共所處的亞洲目前來說，除了原有的俄羅斯之外，另一個軍事大國即是日本；相較於俄羅斯，日本對於中共的崛起多了一分防衛。中日之間的歷史情節，讓中日關係每每碰觸到這個話題，都會劍拔弩張，日本的右翼份子強烈的主張參拜靖國神社，多次讓中共官方及人民提出抗議。中共在能源取得方面，對於石油、天然氣資源的探鑽，讓日本與中共在東海發生零星的衝突，中共官方基於國家整體發展利益，不願再起戰端，僅以外交方式解決中日之間的衝突，這也是中共在進入國際體系後，實行「和平發展」的具體例證。

中共在冷戰時期與西方世界在意識形態的不同，與美國斷交，然在中

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際，極需西方先進國家在資金、技術上的投入，必然要改善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成為改善中共與美國之間的契機，中國廣大的市場正符合當時美國經濟所需。然而中美之間仍舊存有矛盾，政治上，中共仍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因而成了美國推行制度霸權的最大障礙。安全上，中共是美國防範和遏制的對象。但隨著美國軍事戰略重點的東移及其對華政策日趨強硬，中共逐漸成為美國的首要「戰略對手」。經濟上，中美矛盾的核心是市場准入和貿易平衡問題，而俄美矛盾的中心則是政策規範化與法制化問題。這些都是中共在與美國交往必須注意的因素，更是中共選擇「和平發展」策略的原因。

綜合中共與美國、日本的發展可以看出，儘管中共目前正成為一個大國，然而這個大國基於國家整體的發展及國家利益，在軍事發展策略上，仍舊是以「和平發展」為其主要基調，逐漸將鄧小平時期外交基調「韜光養晦」轉而與其他鄰國甚至其他大國積極交往，這也是現今中共聲稱各項發展的主要策略，更是其所言「和平發展」的具體實現。